

文集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

桂林抗战
文化研究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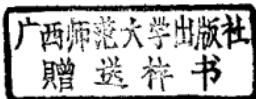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8
K265.03
1
z:5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
桂林市文化局编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



主编 魏华龄
副主编 叶寿保



3 0002 3215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五)

魏华龄 主编

责任编辑:王 梁

封面设计:荒 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625 字数:382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800 册

ISBN7-5633-2542-5/G · 1848

定价:20.00 元

目 录

- 抗日文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刍议 陈乃宣(1)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从持久战总体战略谈起 钟兴锦(17)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社会科学概观及其历史贡献
..... 魏华龄(31)
抗战时期的广西史学 钟文典(执笔)潘香华(56)
从“七·九”事件看桂系联共反共的两种二重性
——兼谈应吸取什么教训 姚 蓝(71)
新发现毛泽东的一篇佚文:《序〈论持久战〉的英译
——释抗战与外援》 万一知(82)
论桂林文化城的鲁迅杂文研究 刘泰隆(88)
桂林和重庆: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苏光文(118)
武汉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之比较研究 徐莉君(131)
论桂林文化在抗战文化城时期的演进 凌世君(141)
- 穿透浓雾的阳光
——谈桂林文化城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 雷 锐(149)
论端木蕻良在桂林创作的风格转换 雷 锐(161)
论抗战时期端木蕻良在桂林的文学创作及意义
..... 李建平(173)
田汉抗战时期在桂林的诗创作探微 蔡定国(184)
廖沫沙在桂林的创作述评 黄高潮(203)
爱国·爱民·爱真理
——评 40 年代巴金同赖蛤恩神父的一场大论战

慧星早陨,壮歌永存	杨益群(209)
——论严杰人和他的诗	黄泽佩(222)
一组高昂的战歌 一串凄婉的歌谣	
——丁玲、萧红在桂林文化城发表小说之比较	苏锡新(257)
桂林抗战音乐活动中的满谦子先生	王小昆(267)
李桦在桂林的抗战美术活动及其贡献	杨益群(274)
纪念韬奋,学习和发扬韬奋精神	魏华龄(289)
杨东莼在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办学思想	
陈劭先先生对桂林文化城的贡献	唐军富 罗小华(296)
张锡昌为桂林抗战文化而忘我工作	植恒钦(313)
杨潮在广西师专及其遇害前后	温致义 何砾峰(326)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及其寓居桂林诗文摭谈	李 磊(340)
抗战年代书作枪	
——桂林文化城抗战图书的出版	龙 谦(347)
略论桂林三家书店在抗战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纪实摄影	李永刚(358)
——兼谈沙飞在桂林的影响	廖国一 雷嗣炯(370)
桂林文化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及其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报刊	刘小林 彭 超(383)
团结的旗帜 抗日的号角	钟小钰(394)

——论桂林《救亡日报》的时代特色及其编辑风格	张鸿懋(407)
浅谈桂林抗战教育取得的成就及其原因	蒋桂珍(416)
桂林文化城时期的青年运动初探	刘春燕(427)
桂林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蓝海(444)
读《桂林抗战文学史》札记	蒙树宏(456)
略评邵荃麟等论述《阿Q正传》主题和思想意义 的贡献	刘泰隆(465)
重读《阿Q的死》	刘泰隆(475)
评《湘桂线上——李超剧作选》	李复兴(482)
论抗战著名话剧《蜕变》	*
——兼论编写抗战文学史的一个原则问题	岳小燕 刘泰隆(490)
新发现的欧阳予倩歌剧本事稿	蔡定国(505)
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1~3)集中	
若干问题的意见	陈大文(512)
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的一些意见	陈大文(526)
为“广西宪政协进会”正名	魏华龄(531)
对《桂林文化城概况》一书的若干订正	李建平(539)
关于茅盾、艾青抗战文艺活动若干史实的补正 	李建平(545)
对一部研究茅盾著作的几点意见	邓祝仁(551)
《漓江感旧·王鲁彦之死》有误	邓祝仁(553)
后记	编者(555)

抗日文化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刍议

陈乃宣

抗日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极其辉煌的一页。同时，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抗日文化在唤起民族的觉醒，鼓舞人民的斗志，揭露日寇的罪行，反对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一、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缘起夏商周，中经盛唐，直至元明清，绵延至今，高峰迭起，盛极一时。无论是自然科学重大发明，还是社会科学繁花似锦，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令炎黄子孙引以自豪。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进入了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曾响亮

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像李大钊所说的那样：“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故余之掊击孔子，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②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反对旧道德、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文化革命运动，把历史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阶段。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抗日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殊形态。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包含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斗争。毛泽东说过：“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③可见，抗日的文化斗争，是抗日战争的一方面，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占有特殊地位。

抗日文化，按不同的地区来分有三种，即国统区的抗日文化；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文化；沦陷区的抗日文化。

1. 武汉、重庆——国统区抗日文化的中心

抗战初期，武汉已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也是全国临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办公。武汉是南京到重庆的中转站。11月3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汉口特三区管理局开始办公。12月2日，各国驻华使节移驻武汉。接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政部、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侨务委员会、邮政储金总局等先后到达武汉。南京失陷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相继移驻武汉。一时间，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文等方面的重要人物，都集中到武汉。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迁汉后，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也来到武汉。第三党、救国会的领导也来到武汉。

1937年底，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时说：“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④大批文化机关、团体和文化界人士从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纷纷涌向武汉。上海新学识杂志社的徐步、胡绳，战时教育社的白桃（戴白韬）、刘季平、光明副刊社的杨朔，七月文艺社的胡风、肖军、肖红，战火文艺社的聂绀弩、丽尼、罗烽，还有老向、何容、沈从文、丰子恺、宋云彬、郁达夫、王平陵、袁牧之、楼适夷、孙师毅、金钟华、张仲实、钱俊瑞、杨东莼、彭康、何伟、王洞若等，也辗转来到武汉。上海沦为“孤岛”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蚊社、上海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及杜国库领导的第八战区战地服务团、胡蓝畦领导的第九战区劳动服务战地服务团、熊佛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王泊生领导的山东省立剧院、唐槐秋率队的中国旅行剧团、南京铸魂学会、南京中国文艺社、马彦祥、宋之的、崔嵬、丁里、塞克、贺绿汀、王震之、欧阳山尊等人组成的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第一队，洪深、冼星海、金山、王莹、田方、白露、张季纯、欧阳红缨、熊塞声、顾一烟、田烈、贺路等人组成的演剧第二队，赵丹、郑君里、章曼萍、应云卫、魏曼青、王为一、沙蒙、舒非、吕班、叶露茜、魏鹤龄、吕复、舒强、于伶、顾而已、陶金、舒绣文等人组成的演剧第三、第四队等，都云集武汉。茅盾、老舍、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均汇聚于江城，他们是抗战初期武汉文化运动的中坚柱石。至1937年底止，各地陆续到汉的文化团体多达100～200个，各类文化知名人士多达千人以上。可谓精英荟萃，群彦毕集。

为了使在汉各文化团体和各类文化人士“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⑤。1938年3月27日，由冯玉祥、劭力

子、茅盾、田汉、艾青、光未然、胡风、胡秋原、洪深、阳翰笙、陈铭枢、冯乃超、张道藩、刘白羽、端木蕻良、张仲实等 96 人共同发起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了,这是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接着,以中国当时文化界的名流巨子为主体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于 1938 年 4 月 1 日在武汉正式成立。这是国统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个以民众团体的名义,一个以政府的名义,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推进了武汉抗日文化运动的勃兴,使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文化的中心。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大批文化机关和文化界人士内迁。内迁分两支,一支去延安,一支去重庆、桂林等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主任老舍于 1938 年 7 月底携带总会印鉴到重庆开展工作。9 月,“文协”迁重庆。与此同时,第三厅也内迁重庆,厅长郭沫若于 1938 年 12 月底到达重庆。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作家、领导人都汇集山城。他们是: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洪深、田汉、夏衍、曹禺、老舍、熊佛西、石凌鹤、于伶、宋之的、陈白尘、马彦祥、吴祖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贺孟斧、应云卫、章泯、张骏祥、郑君里、王瑞麟、孙师毅、司徒慧敏、葛一虹、赵铭彝、辛汉文、沈硕甫、孟君谋、陈瘦竹、陈治策、杨村彬、潘子农、阎哲吾、周彦、余上沅、董每戡、白杨、舒绣文、黎莉莉、张瑞芳、杨露茜、凤子、吴茵、叶露茜、李恩琪、章蔓萍、叶子、赵惺如、赵慧深、秦怡、金山、赵丹、蓝马、陶金、陈天国、项堃、王班、沙蒙、夏天……,他们当中许多人有的是山城剧坛璀璨的明星,有的是对敌冲锋陷阵的猛将,有的是著名的作家、作曲家、画师,真可谓人才荟萃,共赴国难。

高等院校迁往重庆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

中央政治大学、陆军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兵工学校、国立医药专科学校、国立江苏医学院、国立中央工业专科学校、私立朝阳学院、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东吴大学、法商学院等也纷纷迁来重庆。重庆成为继武汉之后的国统区抗日文化中心。

2. 延安——抗日文化的摇篮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华儿女向往的地方，先后到达延安的进步文化人士主要有：周扬、周立波、周而复、赵树理、柳青、丁玲、欧阳山、刘白羽、柯蓝、贺敬之、康濯、秦兆阳、丁毅、杨绍萱、齐燕铭、姚仲明、水华、陈波儿、王大化、路由、李纶、魏晨旭、任桂林、黄既、李波、马可、柯仲平、罗烽、于黑丁、马健翎、吴雪、陈戈、丁洪、戴碧湘、艾青、李季、田间、郭小川、杨朔、李冰、张志民、严辰、刘御、鲁藜、戈壁舟、蔡其矫、肖三、吴伯箫、贺绿汀、肖军、艾思奇、严文井、陆定一、凯丰、何其芳、荒煤、范文澜等。她集中了全国优秀的作家、戏剧家和艺术家。

延安的文化社团，自抗战以来，盛极一时。主要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延安平剧研究院、延安歌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陕公剧团、延安业余剧团、鲁迅研究会、鲁迅艺术实验剧团、枣园文工团、烽火剧团、延安部艺、人民剧社、战斗剧社、挺进剧社、军直文艺室、联政宣传队、抗战剧团、边保剧团、战烽剧社、战歌社、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中央剧团、平凡剧团、战号剧团、青年剧团、锄头剧团、西北剧团、人民抗日剧团、人民抗日剧社总社、抗大文艺社、抗

大文艺工作团、文艺突击社、战地社、路社、工厂文艺小组、战斗宣传队、385旅文艺宣传队、3旅宣传队、4军11师宣传队、陕甘宁边区西北文艺工作团等，在中共中央文委的领导下，抗日文化运动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文化期刊如雨后春笋拔地而出。主要的如：《中国文化》、《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鲁迅研究丛刊》、《草叶》、《文艺》、《解放日报》副刊、《西北儿童》、《街头诗》、《谷雨》、《诗刊》等。别开生面的延安戏剧，如《白毛女》、《兄妹开荒》、《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王秀鸾》、《夫妻识字》、《动员起来》、《王克勤班》、《刘顺清》、《周子山》、《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风貌一新的延安诗歌，如《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王贵与李香香》、《十绣金匾》、《枯树开花》、《高楼万丈平地起》、《胜利进行曲》、《自卫军歌》、《八路军的铁骑兵》、《官兵团结一条心》等。生机盎然的延安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龙烟村记事》、《洋铁桶的故事》、《腊梅花》、《幸福》等。繁花似锦的报告文学，如《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延安生活》、《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陕北风光》、《黑红点》、《火焰山上种树》、《南泥湾》、《新村》等。所有这一切表明，延安抗日文化运动盛况空前，延安成了中国抗日文化的摇篮。

3. 沦陷区的抗日文化

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专制和奴化教育，鼓吹什么“东亚共荣”、“王道乐土”、“五族共和”、“国民道德”等殖民主义理论，妄图泯灭我民族意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

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海淫海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⑥奴化与反奴化、控制与反控制、摧残与反摧残、毁灭与反毁灭的斗争，就是沦陷区抗日文化斗争的重要特点。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坚韧不拔的斗争。

在东北抗联文学中，如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和《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以豪迈的气势鼓舞战士英勇杀敌，唤醒中朝民族携手团结勇猛冲锋。李兆麟的《露营之歌》，生动地表达了抗联战士克服困难，誓死夺回祖国河山的坚强意志。共产党人姜春芳、罗烽、舒群、金剑啸和进步作家白朗、肖红、肖军、金人等，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文艺活动。在长春《大同报》上开辟了《夜哨》周刊，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创办《文艺》周刊，在《黑龙江民报》副刊《荒田》上也办了个《艺文》周刊，揭露敌人侵略罪行，鼓舞群众抗日斗争。金剑啸的诗歌《兴安岭的风雪》，感情浓烈，格调高昂，气势磅礴，节奏鲜明，韵律和谐，以曲折含蓄的笔法，表现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进步诗人田贲组织的“灵菲社”，创刊了《行行》和《星火》，刊登进步文学作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们坚持使用健康、鲜明、形象的民族语言，抵制用日文写作。

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了8年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主持

辅仁大学，常以“爱中国，外夷狄，斥降敌，表遗民”，来勗勉国民，鞭策自己。在课堂上宣传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气节，带领全校师生与敌人周旋，直至抗战胜利。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面对敌人的威胁恐吓，他毫不畏惧，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表白自己的心志。留在上海的剧作家李健吾、顾仲彝、姚克、杨绛、黄佐临、费穆等，抵制汉奸文学、清闲文学对人们心灵的腐蚀和毒害，曾创作和改编了《秋海棠》，由若干剧团演出，运用借古讽今、隐晦曲折的艺术手法，揭露侵略者的不义，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警醒民心，深受观众喜爱，连续上演 135 场，创历史纪录。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的马叙伦，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任主席，后困居沦陷了的上海，改名邹华孙，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民族气节不可丢！”他痛斥卖国投敌的汪精卫集团。并作诗以表忧国忧民之情。“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针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表达了人民抗日的斗志。上海沦陷后，他拒绝演出，蓄须脱离舞台，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天津，出现了《高仲铭纪事》、《炼铁工人》、《抗战》、《匡时》、《前哨》、《火线上》、《突击》、《后方》等 20 多种小型抗日报刊。在上海，出现过《酱工月刊》、《东吴团契》、《青白报》等地下报刊。还有《万象》、《春秋》、《小说月报》、《文艺春秋丛刊》、《紫罗兰》等 20 多种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或综合性刊物。在台湾，日本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各级学校一律禁开汉语课，报纸杂志禁用汉文出版，甚至祖传姓氏也得改为日本姓氏，妄图用“大和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泯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但台湾抗日文化并没有被压垮和毁灭。张文环、黄得时、王并泉等人，于 1941 年 5 月组成了抗日文学社团启文社，创办了《台湾文学》季刊，登载了张文环原

著、林傅秋改编的话剧《闯鸡》，表现了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吴浊流的《先生妈》和《陈大人》两篇小说，对见利忘义的民族败类进行了鞭鞑和讽刺。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描写了一个台湾青年走上抗日道路的坎坷经历。诗人巫永福的《祖国》，在诗中高呼“还给我们的祖国啊！”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表现了对日本统治者的无比憎恨。

二、抗日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必然具有自身的特色，这就是抗日文化的基本特点。

1. 弘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抗日文化的主题

中华民族是富有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弘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历来是动员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推动力和战斗力。我华夏子孙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辽阔的大地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不让区区三岛倭奴的铁蹄践踏我领土，蹂躏我民族。爱国主义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民，为国家民族而战、而死的决心。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发出了民族的怒吼，唱出了人民的心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谁要是把它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敌人向哪里进攻，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国”！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充分表达了我中华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决心，谱写了一部爱国主义的英雄史诗。

2.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抗日文化的目的

抗日战争，既是一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也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我爱国同胞（包括海外侨胞）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决战沙场，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文化正是战胜日寇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的生动记录和英雄赞歌。卢沟桥的炮声，淞沪抗战中的八百壮士，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歼敌，这些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正是抗日文化的最好题材，如《华北的黎明》、《北战场精忠录》、《四万万人民》、《延安与八路军》、《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大型纪录片，以及有关的报告文学，就是反映抗日斗争的生动篇章。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行列，愤怒斥责日寇侵华暴行，热情讴歌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业绩。当抗日的炮声隆隆地响起的时候，茅盾赞美道：“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⑦

3.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抗日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关于革命文化

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抗日文化的光辉旗帜，也是整个抗日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化战线的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又给政治以重大影响。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抗日文化的方向。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讲话》始终是指引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光辉灯塔和胜利的旗帜。

延安是抗日文化的摇篮。延安的抗日文化运动，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模范，延安抗日文化的方向，是全国抗日文化的方向。沿着这一方向，在文化的百花园里，呈现出大众化、民族化、科学化的新气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实际行动。

4. 建立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现抗日文化的途径

毛泽东说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⑧。鲁迅生前也说过：“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⑨在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很高兴地指出：“今天到会场后最大